

日本漢學叢刊

# 日本江戸時代の考證學家及其學問

著者／連清吉



ISBN 957-15-0925-6



00200



9 789571 509259

連清吉 著

# 日本江戸時代の考證學家及其學問

臺灣學書局 印行

日本江戸時代の考證學家及其學問

／連清吉著．--初版．--臺北市：

臺灣學生，1998(民87)

面；公分

ISBN 957-15-0924-8 (精裝)

ISBN 957-15-0925-6 (平裝)

1.漢學 - 日本

033.1

87016765

日本江戸時代の考證學家及其學問

著者：連清吉

出版者：臺灣學生書局

發行人：孫善治

發行所：臺灣學生書局

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一九八號

郵政劃撥帳號〇〇〇二四六八號

電話：二三六三三一五六

傳真：二三六三三三四

本書局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版北市業字第玖捌壹號

印刷所：宏輝彩色印刷公司

地址：中市永和路三六三巷四二號

電話：二二二六八八五三

定價  
精裝新臺幣二七〇元  
平裝新臺幣二〇〇元

西元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初版

03403

究必害侵・權作著有

ISBN 957-15-0924-8 (精裝)

ISBN 957-15-0925-6 (平裝)

## 町田序

德川三百年的學術大略可分爲三期。第一期是德川家康創立幕府（一六〇三）到第八代吉宗治世的一百二、三十年間，由於藤原惺窩、林羅山等人的倡導，朱子學受到幕府的重視而定爲教學的正統。至於標榜反朱子學的伊藤仁齋、荻生徂徠也於不久之後登場，別出蹊徑而樹立古義學派與古文辭學派，廣泛地吸收中國古典的精華，進而展開獨創性的研究。就日本儒學的發展而言，此一時期是學術研究的全盛期。

吉宗治世的後半到第十代家治的五十多年是第二期。爲徂徠古文辭學派的鼎盛時期，詩文創作極其旺盛。在學術研究方面，雖然沒有像第一期一樣有傑出的學者出現，學問卻能普及於民間。

十一代的家齊到末代將軍慶喜的八十年間是第三期。一七九〇年，老中松平定信力諫「寬政異學的禁令」而獨尊朱子學。由於朱子學定於一尊，林家官學的傳統得以恢復其學術領導地位。雖然如此，當時的學術界不但有古學派、折衷學派、考證學派等中國學的流行，本土意識的勃興而帶動的國學研究與西洋文明的衝擊而引發的洋學探索也一時盛行。第三期的學術研究呈現出諸學共存百家爭呼的蓬勃現象，可以說是日本儒學發展的第二個頂點。此學術現象持續至幕末維新的十九世紀七十年代。

德川期的漢學發展和中國的學問相比，到底有何不同，而其特質又何在。就社會構造而言，中國是通過科舉取士而形成的文人主導的社會。日本則是以武士爲主的社會。由於社會的主流階層有異，對於儒家經典的研究取向也自然不同。誠如本書第六章〈清代與日本江戶時代經學考證學的異同〉所論述的，因爲國情的不同，日本儒者對於中國古典進行注釋的有不少，其中數量最多也最有特色的是《左傳》和《四書》的研究。在中國與江戶同時期的清朝學者，則傾注全力於《公羊傳》與《說文》的研究。

於德川第三期學術界大放異彩的是考證學派的研究。有日本考證學始祖之稱，而且學術成果足與清朝考據學相提並論的是大田錦城。本書第二章即對大田錦城以實證主義爲主的學問進行探究。繼承大田錦城實事求是的學問性格而探索獨自考證方法的是龜井昭陽。誠如本書第三章〈龜井昭陽：建立日本考證學的方法〉所論述的，龜井昭陽嘗試超越個別性的字句校勘，而從全體性的文章體例與篇章結構的分析，歸納出考證的法則，從事中國古典的考據工作。由於有考證方法的發現，考證學才能有新的開展。具體性的字句考證是清朝考據的所長，抽象性的原則歸納則是日本考證學的特色。

接續前人的考證方法，徹底地從事中國經傳諸子的個別研究，從而累積學術成果，是集江戶儒學之大成的安井息軒的學問特色。本書第四章〈安井息軒：集日本考證學的大成〉與第五章〈安井小太郎：整理日本考證學的成果〉是通過「伊藤仁齋—大田錦城—龜井昭陽—安井息軒」之考證學系譜的考索，辨析日本漢學的特質，乃是連君爲探究近代日本漢學研究

而踏出的第一步。

初識連清吉君是由於台灣師範大學教授黃錦鉉先生的介紹，在台北車站前的中國飯店見面的。當時連君已是專科學校的專任講師，卻欲辭去教職，毅然至日本留學進修。從言談當中，可以感受到其對學問的執著與研究的熱忱。

從識面到現在已將近十年的歲月。由修完九州大學中國哲學研究所博士課程，擔任九州大學中國哲學研究所助教，到現在任職鹿兒島純心女子大學。且於去年取得九州大學文學博士學位。從十年的留學歷程看來，連君似乎是一帆風順萬事順遂。但是，事實上即使有家人的理解、支持，與在台師友的鼓舞，在異國的求學並非易事。連君能克服一切艱辛，才有今日的成就。不僅如此，其明朗樂觀、積極進取與擇善固執的個性，無須臾而或失。這又是日本友人所共睹的事實。

本書是連清吉君一系列日本漢學研究成果的一部分。我從其研究中獲得極大的啟發。今後深切地企望連君能有更精進的研究，將日本的學術傳播到世界的漢學界。

九州大學名譽教授 町田三郎

一九九七年十月十七日序於福岡

# 前言

十七世紀初，德川掌政，命藤原惺窩傳朱子學；又立藤原氏的弟子林羅山爲「大學頭」，自此德川幕府二百六十多年間，朱子學始終爲日本漢學的顯學。十八世紀初，講了一百多年的朱子學，其研究或有勢窮的趨向，故享保元年（一七一六）以後，乃有反朱子學，即以爲朱子學並非孔學真傳的各學派產生。如古學派的學者即捨宋學而就漢唐注疏之學，主張從字義訓詁來理解孔學真義。進而衍生出本土學問意識，即以「國字」（日本）訓解中國古典的著述，使初學者皆能廣泛閱讀，促進漢學的研究。再者，由於重視考證，逐漸產生疑古意識，即以爲儒家經典存在著真偽的問題，而提出獨自的見解。如「古義學」的伊藤仁齋以爲《論語》二十卷，依文章的形式體例，宜分爲前論與後論各十卷。而「古文辭學」的荻生徂徠則主張《論語》不僅是行之於身、用之於世的根據所在；是與《周禮》《荀子》同爲探究先秦典章制度的重要依據。再者，荻生徂徠又主張除了沿襲已久的「俚諺抄」、「俚諺解」<sup>①</sup>外，也應當用「國字」解詁中國的經傳諸子，以普及教學，進而在本土生根，形成日本化的漢學。

① 所謂「俚諺抄」、「俚諺解」，是以俚俗諺語解釋漢籍的一種解釋方法。流行於江戶初期。

寬政二年（一七九〇）、幕府頒布「異學之禁」，即獨尊朱子學，以其他學派的學問爲異端，而不准教授。雖然如此，官學昌平黌及各藩藩校固然講授朱子學；但是被視爲異端的陽明學、古文辭學及考證學並未因此而斷絕。是故，此後的學術風尙一變，除了官學之外，私人的研究與傳授，則轉趨於純學術的探究。亦即政教分立的情形與「趣味主義」②逐漸形成。

江戶末期，考證學鼎盛，即以清代考據學爲學問研究的新方法，專注於精細的訓詁考據之研究。因此，此時的學術界極推崇窮究經術的學者。幕府官學爲了順應潮流，破格任用非朱子學者而長於經傳研究的安井息軒，拔擢爲昌平黌的教授。是知，以精密的研究，審慎詮釋中國古典精義的學問，是寬政異學之禁以後，日本漢學的主流。綜括江戶時代二百六十多年的漢學發展大勢，蓋可分爲三個階段。③

第一期（一六〇三—一七二六）

朱子學勃興（受容期）

第二期（一七一六—一七八七）

② 所謂「趣味主義」，是以自己的興趣爲主而從事文藝創作與學術研究的一種主張。興盛於江戶中葉以後。

③ 江戶漢學的分期，參考牧野謙次郎《日本漢學史》與町田三郎先生之說。

諸學興盛（批判的受容期）

第三期（一七八七—一八六六）

朱子學一尊而漢學鼎盛（諸學燦爛期）

各時期之學術風尚的轉移，固然有其不得不變的必然趨勢；然而其主導因素，除了政令頒行致使其變之外，學者於學術意識與時代感受的覺醒，更是促使學風轉變的主要因素。

鎌倉時代（一一九二—一三三三）末期，由於學問僧將「宋學」傳入日本後，在漢學的研究上，逐漸形成古註與新註的分別。如《論語》的研究，原來是以何晏、皇侃的義疏為依據，<sup>④</sup>但是，鎌倉末年，京都五山<sup>⑤</sup>的禪僧開啓講授《朱子集註》的先聲。江戶初期，德川家康任用朱子學者林羅山以振興文教，朱子學遂成幕府的官學。而林羅山（道春）訓點的《論語集註》遂取代何晏的《集解》和皇侃的《義疏》成為家家戶戶傳誦的經典。至於研究老、莊的根據也是如此，即由河上公註、郭象註轉為林希逸《口義》。此為江戶初期漢學發展的狀況。換言之，即所謂漢唐注疏的「古註」之研究逐漸式微，取而代之的是所謂「新註」的宋學。

十七世紀中葉，在接受朱子學的同時，也產生了對朱子學存疑的主張。其主要人物是「古義學派」的伊藤仁齋和「古文辭學派」荻生徂徠。伊藤仁齋（一六二七—一七〇五）指出：

④ 日本的《論語》書目，載見《日本國見在書目》。

⑤ 「五山」是指在京都的五所禪寺，是鎌倉時代傳授學問的中心所在。

宋儒之意以爲學當言義，而命不足道。此不深考而已。蓋有當言義處，有當言命處。何者？出處進退在於己，言義可矣。若夫國之存亡，道之興廢，專繫於天，當言命而不可言義。（《語孟子義》上<sup>⑥</sup>）

即從字義之理會而探究聖人之立說要旨，進而指摘宋儒議論失確之處。故其子伊藤東涯序《孟子古義》<sup>⑦</sup>說：「（程朱氏）解仁以爲心之德，愛之理。性即理也。則將以翼之，適以病之。……先君子既釋《論語》，並及此書，共名古義，欲其斥後世虛遠之旨，而直邇乎古之義也。蓋謂《孟子》者，《論語》之義疏也，欲識《論語》，不可不由此書焉。」則說明欲探究孔子立言的真義，宜從《孟子》入手；而要釐清《論語》《孟子》的宗旨，則不能遵從宋人門徑；應從漢儒古註的訓解中體會得來。

荻生徂徠（一六六六—一七二八）與仁齋相同，都是先研究朱子學；而後以爲朱子學未必能體得聖人真義。徂徠著《論語徵》十卷，乃從先秦古書的用字例，逐一探究《論語》字詞的意義，進而給予正確的解釋。例如孔子之「道」，徂徠以爲是「先王之道」，即「安民之道」；而不是「天地自然」的形上之道<sup>⑧</sup>。換言之，徂徠從訓詁學的角度深入探討，以爲孔子所說

⑥ 《語孟子義》成於天和二年（一六八二）。附於《論語古義》十卷、《孟子古義》二卷之後。

⑦ 《孟子古義》成於享保五年（一七二〇）。

⑧ 徂徠的「先王之道，即安民之道」主張，見徂徠所著《論語徵》及《辨道》。

的「道」，是維持社會秩序的規範。因此，其強調《論語》是研究先秦典章制度的重要根據之一。同樣的方法，徂徠以爲《論語》的時代並不存在「理」、或「天理」的辭彙，故謂朱子用理和天理來詮釋《論語》，是未必允當的。

仁齋、徂徠學說盛行的元祿（一六八八—一七〇三）、享保（一七一六—一七三四）年間，日本漢學界呈現出「反朱子學」的風潮。從文化接受的觀點來說，在接受顯學的同時，也出現批判顯學的主張。因此，或許可以用「批判性受容」一詞來說明此一時期的江戶時代的漢學。

天明七年（一七八七），松平定信任老中，欲振興儒學，矯正人心風俗，乃以學問所爲天下教學之中心。寬政五年（一七九三）林述齋繼任大學頭後，即改革學問所的學制，編修《武家名目抄》《寬政重修諸家譜》《新編武藏風土記》《佚存叢書》等與國史有關係的書籍。命令十萬石以上的諸侯出版大部的書籍。自身專心於學問所的改革等事務，至於林家家塾的學問傳授，則委託弟子佐藤一齋。如此，學問所與林家家塾同心協力，以振興斯文爲急務。林述齋的弟子有佐藤一齋、松崎慊堂。慊堂由朱子學而入漢唐注疏學。一齋兼治朱子、陽明學。慊堂的門下有塩谷宕陰、安井息軒。宕陰善於文章、息軒兼採漢唐舊說與清儒考證之學而出入於仁齋、徂徠、朱子學。一齋的弟子有治朱子學的大橋訥庵、安積良齋，攻陽明學的山田方谷、吉村秋陽、東澤瀉等人。於是，文化（一八〇四—一八一七）、文政（一八一八—一八二九）至嘉永（一八四八—一八五三）安政（一八五四—一八五九）的五、六十年間，朱子學、陽明學、考證學的大家並出，文物燦然，盛極一時。此爲江戶時代第三期漢學發展的情形。

第二期的漢學發展中，既有「批判性」的接受，則未嘗沒有獨自見解的產生。如伊藤仁齋的《論語古義》以爲《論語》宜區分爲上論、下論各十篇。其區分的根據是〈鄉黨〉篇的內容殊異，乃上論的末篇。又對於管仲的評價，上論與下論有顯著的不同，故《論語》宜區分爲上、下兩部分。至於《孟子》則宜分爲上《孟》（前三篇）與下《孟》（後四篇）。而程朱所尊崇的《大學》則「非孔氏之遺書」<sup>9</sup>。伊藤仁齋的生存年代，相當於清朝初期，比顧炎武小十四歲、小閻若璩九歲。但是由於大海相隔，交流不便，仁齋未必明瞭清初的研究動向；然而不墨守江戶幕府官學的程朱宋學的傳統，以實證主義的觀點，對於儒家的經典進行嚴謹的文獻考證，藉以正確闡述發明孔門學說的真義。此一學術態度與乾嘉考據學的研究旨趣頗爲相應。因此貝塚茂樹說伊藤仁齋是「日本儒學的始祖」，日本啓蒙主義運動的先驅。<sup>10</sup>

荻生徂徠高舉「反朱子學」的旗幟，提倡「古文辭學」，尊奉李攀龍、王世貞「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主張，進而鼓吹詩文要從道德的約束中解放出來的學風，因此「古文辭學派」盛極一時。這是徂徠主張以明代詩文的自由風氣而反對宋學的拘謹嚴肅。換言之，是「接受」最新的中國學而批判朱子學的。但是，對荻生徂徠的著作中，值得留意的是「國字

⑨ 分《孟子》爲上《孟》與下《孟》的論述見於《語孟字義》上卷。「《大學》非孔氏之遺書」的論說則見於《語孟字義》的附錄。

⑩ 貝塚茂樹〈日本儒學的創始者〉（《伊藤仁齋》、中央公論社、一九八三年、頁七一—頁三三）。

解」的撰述。如《孫子國字解》十三卷、《吳子國字解》五卷、《詩文國字牘》二卷、《明律國字解》三十七卷、《素書國字解》二卷等。所謂「國字解」，是以日文訓解中國的典籍。此「國字解」與江戶初期的「漢籍俚諺抄」，同為易讀易曉的解釋，使初學者能以之而閱讀漢籍。然而「國字解」之產生，又未嘗沒有本土文化意識的自覺存在。亦即在接受中國學，理解中國學者之學術思想的同時，也可以用自身的語文來詮釋漢籍的意義，敘述獨自的見解。影響所及，明治四十年代至大正初期間，有服部宇之吉編集《漢文大系》，早稻田大學出版《漢籍國字解全書》問世。前者不但搜集了中國學者的註疏，也採用日本漢學者的訓解。後者則網羅「先哲遺著」，再加上「國字解」而刊行。兩部叢書的出版，顯示日本人的自覺意識的抬頭，也象徵著其中國觀的改變。追溯自覺意識產生的根源，或許即遠紹荻生徂徠「國字解」之解釋方法而所反映的「本土意識」。<sup>①</sup>

荻生徂徠雖然接受李攀龍、王世貞的「古文辭學」，主張實際寫作漢詩文以理解古文辭的律則，掌握古文辭的真義。但是，荻生徂徠的「古文辭學」並非僅止於詩文的創作，更重要的是其進而提出以古文辭探究聖人之道的真義所在。荻生徂徠以為中國古典的真髓在於先

① 「國字解」於日本漢學史的意義，參重野成齋的《日本の漢學に就いて》（《重野博士史學論文集》上卷、名著普及會、一九八九年）、町田三郎先生「《漢籍國字解全書》について」（《東洋の思想と宗教》、第九號、頁一一頁一六、一九九二年）之所說。

王聖人之道，即《六經》與《論語》。而《六經》與《論語》所含藏的先王聖人之道之真義，乃在於「物」而不在於「理」，進而指出《六經》與《論語》的要旨，皆是政治的方法。荻生徂徠所說的「物」乃是事實，其在所著《辨名》一書中指出「物者教之條件」，即物乃是教育標準的事實。先王所設定的「詩」、「書」、「禮」、「樂」皆非空泛的議論而是作為政教標準的事實。「詩」是民衆與宮廷歌謠，「書」是政治的言語，「禮」是各項儀式，「樂」是雅樂的演奏。換句話說，「詩書禮樂」是構成先王之道的四個要素，即政治法則的「四術」。（見《辨名》）

再者，關於「義」的意義，荻生徂徠引述《左傳·僖公二十七年》「詩書，義之府；禮樂，德之則」與《書經·仲虺之誥》「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之文，主張既然「義」為「詩書之府」，義並非空泛理則。又禮以制心，即禮是行為的準則，則制事的義，乃是對應事物的方法，即禮的運用。換句話說，義是行先王之道的的方法，而非孟子與宋儒所說的義與「仁」並稱，為「德」（「德者個人之德」荻生徂徠解，見《辨名》）之一，即孟子與宋儒主張「道—德—仁、義」。而荻生徂徠則是「道—義（道之用）、德（個人修養而得之道德）」。

以先王之道在「物」，「詩書禮樂」是政治法則的「四術」。又「義」並非與「仁」並稱的德，而是「禮之用」，即實踐先王之道的的方法。二者是荻生徂徠異於宋儒的所在。也是其具有批判性接受中國學的所在。

但是，荻生徂徠並不重視文獻考證，如其引述的《書經·仲虺之誥》，伊藤仁齋已經考

定爲僞作（見《語孟字義》下），荻生徂徠卻引用以爲重要學說的根據。又荻生徂徠提出「注釋無用論」（《徂徠集·與堀景山書》），以爲後世的注釋乃後出的文辭而非古文辭，未必能明確地說明先王之道，故不可信。此固然可以說是荻生徂徠批判性接受前人的所在，也就是就學問性格而言，荻生徂徠不是經學文獻考證學者，而是有自身詮釋系統的經學思想家。

寶曆（一七五一—一七六三）之後，就有所謂折衷學派和古學派的興起。但是當時所謂的折衷學派，只是折衷古注、新注、仁齋、徂徠之說，尙未能樹立一家之言而開拓新局。代表的學者是井上蘭臺、井上金峨。至於金峨的門下山本北山似有別立一派而入清儒考據學的趨勢，但尙不能超越折衷學派的境域。至其弟子大田錦城之時，才有真正的考據學的盛行。

大田錦城、名元貞、字公幹、號錦城。加賀（今石川縣）大聖寺人。明和二年（一七六五）生、文政八年（一八二五）歿，享年六十一。

《九經談》爲大田錦城的代表作，全書共十卷。有總論、及論述有關《孝經》《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尚書》《詩經》《左傳》《周易》九經的諸說，並陳述自己的見解。關於儒家經典，特別是對《五經》作博引旁證，且展開精密議論的研究，是江戶時代的學界所未有的。因此，此書傳誦一時，大田錦城的名聲也爲當時的學術中人所熟知。門人海保漁村敘述《九經談》出刊的情形，說：「此歲，大田錦城師以所撰九經談十卷付之梨棗，學者喧傳，名盛一時」<sup>②</sup>。

《九經談》一書是大田錦城有關考據論述的代表作。其中關於《尚書》，特別是以「梅

本增多小辨」爲題的考據（卷七）又更爲精密。所謂「梅本」是指東晉梅賾所獻漢孔安國《古文尚書》五十八篇。所謂「增多」是說「梅本」比在此以前所通行的秦伏生《今文尚書》二十九篇所多出的篇章。大田錦城以爲「梅本」所「增多」的篇章和孔安國的傳都是魏王肅等人所僞作。

就今日而言，雖然有關《古文尚書》與「今文尚書」的問題，由於清代閻若璩等人考據的成果，《古文尚書》增加的部分乃爲後人所僞作的事，已經成爲定說。但是在江戶末期的日本學界並未留意到此一問題。大田錦城之提出「梅本增多小辨」以考證《古文尚書》爲僞作等有關《尚書》的考據，可以說是日本學界最有成就的。換句話說就日本儒學界而言，對《尚書》作精密地的論證，並論斷《古文尚書》之爲僞作的考察，可以說是畫時代的研究。此爲《九經談》之所以獲得極高評價的所在。藤田幽谷在「錦城先生大田才佐墓表」所敘述的「上自先秦古文，下至後世雜書，苟有關經義，莫不旁引曲暢，審其同異，辨其是非。其漢唐宋明，及近時清人，與我國朝諸儒之說，會萃演繹，必歸諸至當而止。」誠精當地闡述大田錦城於學術成就的所在。明治時代的漢學者安井小太郎也指出「就我邦考證家而言，宜以錦城爲嚆矢」<sup>15</sup>。

12

《漁村海保府君年譜》（《儒林叢書》十四卷所收）。

15

《日本儒學史》（富山房、一九二五年）、頁二四五。